



方旭红◎ 著

集聚·分化·整合

——1927—1937 年苏州城市化研究



JIJU FENHUA ZHENGHE

——1927—1937NIAN

SUZHOU CHENGSHIHUA YANJIU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本书获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费项目资助
(项目编号:05BS401)

集聚·分化·整合

——1927—1937 年苏州城市化研究

方旭红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集聚·分化·整合:1927—1937年苏州城市化研究/方旭红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 1

(近代国家与社会丛书)

ISBN 978-7-5650-0626-5

I. ①集… II. ①方… III. ①城市化—研究—苏州市—1927—1937
IV. ①F299.27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9028号

集聚·分化·整合

——1927—1937年苏州城市化研究

方旭红 著

责任编辑 章建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邮编 230009
电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hfutpress@163.com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毫米×1010毫米 1/16
印张 23
字数 425千字
印刷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0626-5

定价:48.00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近代国家与社会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 王卫平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平	王国平	王玉贵	韦 恒
卢伯炜	池子华	余同元	孙海泉
朱从兵	朱小田	陆建洪	李 峰
单 强	俞 政	黄鸿山	

主 编 池子华

执行主编 朱从兵

执行副主编 王玉贵 黄鸿山

总 序

《近代国家与社会丛书》为江苏省重点学科苏州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点标志性成果之一，旨在通过对近代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重大问题的研究，揭示近代社会发展变迁的内在规定性，推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苏州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自著名史学家柴德赓先生 1955 年南下创办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以来，经段本洛、董蔡时诸前辈辛勤耕耘，奠定了较为雄厚的基础，并于 1990 年后相继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点和江苏省重点学科。学科负责人先后为段本洛教授、王国平教授、池子华教授。本学科最初以近现代江南社会经济研究为主要方向和学科特色。为进一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本学科的研究方向不断调整和增加，“九五”期间设有近现代江南社会经济、中国近现代政治与对外关系、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等研究方向。“十五”期间增设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国近现代城市发展等研究方向。“十一五”期间增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方向。

近年来，本学科出版学术专著近 50 部，代表性的著作有：《苏州手工业史》、《左宗棠评传》、《中国近代流民》、《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胡林翼评传》、《严复著译研究》、《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关系重考》、《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研究》等，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光明日报》、《国外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 800 余篇。研究成果多次获省部级科研奖励。

本学科多次承担国家、教育部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继段本洛先生于 1994 年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课题“近代江南农村”后，又相继承担了“16—19 世纪苏州与徽州历史发展差异的比较研究”（主

持人唐力行教授，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农民工与社会变迁——以近代苏南为中心”（主持人池子华教授）、“中国共产党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研究”（主持人王玉贵教授）、“近代中国‘打工妹’群体研究”（主持人池子华教授）、“清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系谱研究”（主持人王卫平教授）、“近代江南社会保障机构的经费收支与运作研究”（主持人黄鸿山副教授）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王国平教授、朱从兵教授、余同元教授、李峰教授承担了国家“清史工程”的研究项目。此外还承担了 10 余项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

目前，本学科的主要研究特色为：在继续保持原有区域（江南）社会经济研究特色的基础上，在社会史研究特别是流民问题、农民工问题以及红十字运动研究等方面，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铁路史、思想史特别是严复思想研究、社会保障、城市史、外交史特别是民间外交史的研究上，也具有一定影响，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为汇聚学科特色，我们将陆续出版团队成员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推进本学科的发展更上层楼。

池子华

2010 年秋

序（一）

城市的形成虽然历史久远，但城市化却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伴随工业化而出现的发展过程。近代以降，随着机器工业的出现和扩张，中国社会也呈现出加速变革的趋势，并由此开启了城市化发展进程。苏州作为我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城市之一，近代以来，因为各种原因，其城市化发展相对不及上海、南京等城市，但在全国也算得风气之先。特别是在1927—1937年这一“十年生聚、十年建设”时期，苏州的城市化发展尤为可圈可点。

旭红博士的《集聚·分化·整合：1927—1937年苏州城市化研究》对这一主题做了有益的探讨。作者通过大量史实，考辨了这一时期苏州城市化发展的规模、水平。作者指出这一时期，苏州的人口有了较大规模增长，人口结构趋于复杂化，家庭规模趋小，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开始变革，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所提升，家庭的民主结构逐渐形成，家庭的功能发生转变；人口职业分化明显，有业人群职业结构趋于复杂，分化细密；市民的“异质性”和“现代性”增强，形成了“以职业分类和工作范畴为参照标准”的现代职业群体；人口素质有所提高，识字人口在总数上已经超过了不识字人口，并且妇女也获得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妇女社会地位有了较大提高；宗教信仰较为多样，有佛教、道教、回教、耶稣教、天主教等多种宗教流行。

作者指出，促进苏州这一时期城市化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于其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现代转变，中国、江苏以及苏州现代交通、通讯网络初步形成等合成的“拉力”效应，以及农村日益严峻的“破产”形势所合成的“推力”效应。作者认为，随着城市化发展，苏州的城市功能定位趋于明确，建设“住宅都会”成为执政者的施政理念；城市面貌开始更新，一批河流、街道得到整治、修缮；城市空间有所拓展，一些新的城市片区开始形成。作者进一步指出，城市化发展，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开始在苏州生成、演化，突出地表现为：居民工资收入、消费水平日趋分化；公共医疗卫生水平日趋改善；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休闲娱乐方式开始多样化、大众化；教育及大众传媒有所发展；社会心理与思想观念开始具有现代意义的转变。

作者还指出，城市化发展也使得苏州的城市问题也日益凸显，诸如生活垃圾污染、工业污染、噪音污染较为突出，环境恶化；瘟疫肆虐，难以根除；

失业、贫困、“棚户”、乞讨等现象大量存在；烟毒泛滥；卖淫现象比比皆是；赌风甚炽；犯罪猖獗；自杀现象增多；离婚激增。作者并对这些城市问题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苏州这一时期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

旭红博士的这本书在对上述问题进行论述时，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一，尝试突破历史学与城市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在1927—1937年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研究方面所存在的疏离状态，一方面，坚持历史学“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注重史实的考证与铺陈；另一方面，借鉴城市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努力把城市史研究与城市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相结合，力求通过对这一时期苏州的城市化个案考察，展示中国这一时期城市化的规模、水平及其状态。

其二，较为详细地梳理了这一时期交通、通讯网络建设状况，特别是对苏州现代交通、通讯网络的初步形成作了细致的考辨分析，指出现代交通、通讯的发展，比如公路的兴建，铁路的改进设施、提速、联网、改善服务，各种交通工具的“联运”，以及长途电话、国际电报等业务的发展，是这一时期苏州城市化的重要导因之一。

其三，论述了中国这一时期兴起的现代城市功能观念和城市规划思想，论证了苏州这一时期建设旅游城市的新的功能定位，并对这一定位作出了客观评价，同时对苏州这一时期的市政建设作了详细评述，并指出了其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

其四，对这一时期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演化生成作了浓墨重彩的论述，特别就衣着的时尚化、城市社会心理的演变等问题作了较为翔实的考察和深入探讨，并指出了这些转变的历史意义。

其五，条分缕析地研究了这一时期的各种城市问题，考察其形成的原因，产生的影响，并探讨了当时社会为应对这些城市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成效。

最后，对苏州这一时期初步兴起的城市化潮流所具有的历史启示意义作了多向度的探讨。

自伍子胥建城，经宋元明清的辉煌成局，经民国时期的规划演进，至今日一体两翼的传统保护与现代打造，苏州的城市建设已经跃升历史的巅峰。未来的发展永远需要既往的借鉴，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更因而彰显。学无止境，愿旭红博士的研究更上层楼。

王国平

2011年12月

序 (二)

近代中国社会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自强御侮的奋争中，开始了现代变革。作为这种变革的表征之一，就是中国社会加速了城市化发展进程，城镇体系无论是在职能组合结构、等级规模结构，还是地域空间结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苏州作为我国历史上最为繁华的工商业城市之一，进入近代，其城市化发展水平虽然被后起的上海相对遮蔽，但也有不俗表现，特别是在 1927—1937 年南京国民政府“十年建设”时期，地处经济中心上海和政治中心南京之间的苏州，发展尤为迅猛，城市的规模有一定扩展，人口有所增加，各类生产要素益形集聚，城市功能定位更为明确，城市社会心理和生活方式开始现代转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所完善，城市管理方式有所创新，同时，各种“城市病”也开始显现。

旭红博士的《集聚·分化·整合：1927—1937 年苏州城市化研究》对这些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作者秉持历史学“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通过大量档案资料、政府公报、统计资料、报纸杂志以及有关论著，考辨、铺陈史实，结合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这一时期苏州城市化的规模、水平、状况作了系统论述，分析了苏州城市化的动因，梳理了苏州城市功能定位和城市空间拓展、更新状况，考察了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在苏州的生成、演化，剖析了苏州各类城市问题的形成原因，探讨了苏州城市管理模式的现代变革，并对苏州这一时期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启示作了思考，是一本用力甚巨的学术著作。

旭红博士的这本著作，在以下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考证了 1927—1937 年苏州聚集人口的数量、人口结构，指出由于当时的户籍制度，以及“两地均有居所者”仅能在一地取得“公民权”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其时苏州的实际人口数与地方政府公布的人口数可能有较大出入。这对人们更全面、深入了解苏州这一时期的城市化规模、水平大有裨益。

第二，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州具有苏南乃至东南地区“次金融中心”功能；并论证了这十年苏州随现代旅游业渐次兴

起，旅游经济也初现端倪。

第三，对这一时期苏州城市化与当时农村面临的“破产”形势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认为农村“破产”的严峻形势，加速了苏州的城市化进程，并且使得苏州城市化表现出明显的“过度城市化”特征，还条分缕析了苏州存在的诸种城市问题，考察了其形成的原因，产生的影响，并探讨了当时社会为应对这些城市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成效。

第四，对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前十年县、市级地方政权的运作模式作了深入考察，分析了这一时期地方政权组织结构的原则、管理模式和管理特点，也指出了其成就与不足。

第五，考察了苏州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集聚、分化、整合的连锁效应，指出这十年的苏州，并非如以往人们所认为的是“停滞型”、甚至是“衰落型发展类型”城市，而是具有勃勃生机的“再生型”城市，并指出苏州这一时期的城市化发展，表明中国至少在部分地区，如江浙一带，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城市化潮流；显示了中国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自强、奋争的历史嬗变、特别是在经历了“戊戌”和“五四”两次思想启蒙运动之后，已经逐渐具有了现代“公民国家”的诸多因子。

历史研究最终是为现实服务的。旭红博士对苏州这一时期城市化的历史启示意义作了较为深入地思考，认为在城市化过程中，需要大力促进交通、通讯网络建设，形成优化、合理的产业布局，使城市与乡村形成协调运转、和谐有序的良性互动；要对城市形成明确、清晰的功能定位，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确定城市发展目标，规划城市各项基础建设。随着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演化生成，需要优化城市物质和精神生活设施，促进积极、健康、崇尚平等、富于进取的城市社会心理的形成；积极因应城市化过程的负面效应，妥善解决各类城市问题，注意从系统的、“综合治理”的角度入手，努力消除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文化根源；适时改进城市管理模式，积极进行制度化建设，处理好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注意调动各种力量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发挥各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坚定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取向，注意防止认识上的偏差，以免人为地为城市化发展设置种种“壁垒”；营造安定祥和的国内环境和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以集中精力进行城市化发展。这些思考，对于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城市化发展，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汤奇学

2011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人口集聚与人口结构：苏州城市化的计量分析	(001)
第一节 人口集聚：城市化的量标	(003)
第二节 人口结构：人口积聚形式的量化分析	(012)
一、家庭结构	(013)
二、职业结构	(016)
三、性别、年龄、教育、宗教信仰结构	(027)
第二章 苏州城市化动因探析	(033)
第一节 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现代转变	(033)
一、苏州城市化的历史基础	(034)
二、传统手工业日趋分化	(037)
三、现代机器工业有所发展	(044)
四、商贸金融业现代转换	(050)
五、旅游业渐次兴起，旅游经济初现端倪	(065)
第二节 现代交通通讯网络初步形成	(070)
一、现代交通网络初步架构	(071)
二、现代通讯网络初步形成	(095)
第三节 农村“破产”的“推力”	(115)
一、农村“破产”的形势	(115)
二、农民离村城居的趋向	(123)
第三章 功能转换与城市空间的拓展和更新	(129)
第一节 现代城市功能观念和城市规划思想的兴起	(130)

一、勃兴一时的城市功能观念和城市规划思想	(130)
二、1927 年苏州市政筹备处的城市规划	(135)
第二节 功能转换：建设旅游城市的设想与实践	(142)
一、苏州市政府建设“住宅都会”的施政原则	(142)
二、吴县各界建设“旅游城市”的设想与实践	(144)
三、寻求城市功能转换的意义	(152)
第三节 城市空间的拓展与更新	(153)
一、修路筑桥疏浚河道：城市空间的拓展与更新	(154)
二、消防照明自来水：现代城市公共设施初步奠基	(163)

第四章 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演化生成

第一节 工资与消费：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	(181)
第二节 公共医疗卫生设施：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 物质考察之一	(189)
第三节 衣食住行：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物质考察之二	(191)
一、衣着的时尚化	(192)
二、出行方式的多样化、高效率化	(199)
三、饮食、居住的“摩登化”	(206)
第四节 教育及大众传媒：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精神考察之一 ...	(208)
一、现代教育原则的确立	(208)
二、社会教育勃兴一时	(213)
三、大众传媒的发展与改进	(215)
第五节 休闲娱乐：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精神考察之二	(221)
一、体育运动日益普及	(221)
二、看电影、逛公园、短途旅游成为时尚	(225)
三、读书、看报、听音乐演为新的休闲方式	(230)
第六节 社会心理与思想观念：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 精神考察之三	(234)
一、公共卫生意识和健康观念得到增强	(235)
二、崇尚自然、健康的审美观开始形成	(239)

三、妇女运动方兴未艾，女权意识渐次兴起， 妇女地位有所提高	(241)
四、性教育兴起，性观念趋于开放	(246)
五、婚姻家庭观念逐渐转变	(252)
六、科学意识、“公民”观念、现代商业精神、 “崇洋慕新”风气日渐形成	(264)
第五章 越轨与失范：城市问题日益凸显	(274)
第一节 苏州城市问题的主要表现	(274)
一、苏州城市问题中的“物理性病理问题”	(276)
二、苏州城市问题中的“社会性病理问题”	(284)
第二节 城市问题产生的原因、影响及各方应对措施	(291)
一、苏州城市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291)
二、解决城市问题的努力与顿挫	(301)
第六章 城市管理模式的现代演进	(306)
第一节 苏州市时期的城市管理模式	(306)
一、市的法律地位与苏州市的组织结构	(306)
二、城市管理的分权化、制度化	(309)
第二节 吴县县城时期的城市管理模式	(312)
一、县的法律地位与组织结构	(313)
二、作为吴县县城的苏州城市管理模式	(316)
第七章 余论	(325)
一、苏州城市化的成就与意义	(325)
二、苏州城市化的不足及成因	(331)
三、苏州城市化的历史启示	(334)
参考文献	(336)
后 记	(352)

第一章 人口集聚与人口结构： 苏州城市化的计量分析

如果说“城市是一个坐落在有限空间地区内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相互交织一起的网状系列，是各种活动在地理上的大规模集中”^①的话，那么，城市化无疑就是这一集中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人口的集中，也包括生活方式的传播。人口集中，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使得城市人口相对于整个地区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生活方式的传播，表现为城市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道德规范、闲瑕娱乐等不断影响农村地区，吸引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并逐步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②。而在这一系列大规模集中的过程中，人口集中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标示着城市化发展的规模和程度，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一个重要量标。

城市的产生虽然历史悠久，然而，城市化却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伴随工业化而出现的发展过程。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因素和新的生产方式在英美诸国蓬勃发展及其随后的全球扩张，城市的面貌和命运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化进程逐渐由英美诸国向全球扩展、蔓延，“其势万不可挡”^③。这种世界范围的城市化趋势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就单个城市而言，人口日益增多。如伦敦，1800年为959310人，1939年增至8655000人；纽约，1800年为60489人，1939年增为7575339人；巴黎，1800年为547756人，1939年增至4933855人；柏林，1800年为172846人，1939年增为4242501人；芝加哥，1850年为29963人，1939年增为3677000人；上海公共租界1865年仅有92884人，1937年3月则增为1637000人，全市人口更是增至3789585人。

其二，城市人口在各国人口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如美国城市人口，

① [英] K. J. 巴顿：《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页。

② 朱力等：《社会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页。

③ 《苏州市政月刊》第1卷第2、3号，“论文”，第2页，1929年4月刊行。

1800 年仅占全国人口 4%，至 1930 年则增为 56.2%；英国城市人口，1881 年占全国人口 48%，1930 年则增至 79.5%；德国城市人口，1880 年占全国人口 28%，1930 年则增至 67.1%。

其三，各国城市数目日渐增多。1600 年，欧洲万人以上城市仅有 14 个，1800 年 10 万人以上的城市已有 23 个，1900 年增至 146 个，1920 年则增至 202 个；1800 年，美国 8000 人以上的城市只有 6 个，1900 年则增至 545 个，1930 年更是增至 1208 个；至 1939 年，全世界 2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有 220 个，5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则有 86 个，10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也有 35 个^①。

二战以后，世界范围的城市化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据统计，至 1980 年，世界城市人口总数已达到 18.51 亿，其中发达地区为 8.02 亿，占 44.19%，发展中地区为 10.13 亿，占 55.81%^②。而 21 世纪则更是被人们预称为“城市世纪”，“在人类历史上，将会第一次出现大多数男人、妇女和儿童居住在城市之中的现象”^③。由此可见，世界范围的城市化，是一个难以逆转的历史过程。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降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也开始步入了由远及近加速推进的城市化潮流，城市的规模、数量、人口都有了相当发展，城市功能也趋于多样化。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所谓的“十年建设”时期，中国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化规模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据 1933 年的统计，当时，中国人口在 10 万以上的城市共有 108 个，在 20 万以上的城市有 48 个，在 50 万以上的城市有 13 个，在 100 万以上的城市有 4 个；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比也由先前推算的 20% 增加到 1930 年代的 26%^④。

就苏州而言，在这一时期中国初步兴起的城市化潮流中，其城市化水平和规模虽然不及上海、南京、北平、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但发展也颇为迅速，人口集聚的规模也相当惊人，人口结构也产生了较大变化，在苏南地区仍然具有毋庸置疑的“首位城市”特征。

① 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 1 册），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第 32 页。

② 向德平：《城市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4 页。

③ 第六届世界大城市首脑会议：《北京宣言》（2000 年 9 月 29 日于北京签署），资料来源：中国停车网，网址：<http://www.chinaparking.org/gbstanda/zh-4.htm>

④ 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 1 册），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第 32 页。需要注意的是，孙的数据与前述沈汝生的数据有一定出入，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时期中国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初步的城市化潮流的判断。

第一节 人口集聚：城市化的量标

明清时期，苏州“乃江南一大都会”，既是苏州府城所在地，也是长州、元和、吴县三县县城所在地，有清一代，又是江苏巡抚驻地，是区域政治中心；同时，苏州又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米市”、“最大丝织业加工与销售中心”、“最大棉布集散地与加工中心”，“是江南最重要的中心地”^①，在江南地区市场体系中，具有“超地域中心城市”^②的地位，是江南、乃至全国经济中心之一。因此，明清时期，苏州人口极为稠密。据龙登高研究，明中叶，苏州府城（城内及城厢附郭）人口即达到50万规模^③；而至清中叶，据王卫平研究，苏州人口更是达到创纪录的100多万水平^④。虽然也有学者对清中叶苏州人口数达到100多万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曹树基、王树槐等人即认为，清中叶，苏州城市人口约在50万左右，王树槐并以光绪二十七年海关报告的相关内容为例，证明这一数据也是历史上对苏州城市人口相沿成习的说法^⑤。但不管怎么说，明清时期，苏州城市人口已经极为稠密，达到了相当规模，当是毋庸置疑的^⑥。

然而，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接连遭遇了诸如太平天国运动、漕运改道、上海崛起致使区域经济中心转移等一系列重大历史变故，苏州开始呈现出相对衰落的疲态，人口大为减少。迨至清末民初，一度滑落至谷底，城内及其附郭仅有32994户^⑦，据王树槐估算约为17万人^⑧，与鼎盛时期的清中叶相比，已然判若云泥。此后，苏州人口开始逐渐回升，至1927年升为261709

① 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40页。

② 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

③ 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④ 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5页。

⑤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57页；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8）1984年版，第496页。

⑥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各种数据，均系估算所得，在精确性上尚存缺憾。尽管如此，明清时期，苏州城市人口已经极为稠密，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当是无疑义的。

⑦ 曹允源等：《吴县志》卷四九，“田赋”，苏州文新公司1933年钤版，第3页。

⑧ 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8）1984年版，第496页。

人^①，1931 年又升为 298116 人^②，1933 年底至 1934 年初再升为 336477 人^③，1935 年重上一个新台阶，达到 389797 人（参见表 1-1、表 1-2）^④。

表 1-1 晚清至抗战爆发前苏州人口变动趋势

年份	户 数	人 口 数			备注
		男	女	总数	
1906	32994			约 17 万	①
1909	51788			256524	②
1924	53247	166165	105633	271798	③
1926	56412	165423	107618	264041	③
1927	52532	146555	125254	261709	③
1928	52532	165299	105410	261709 (289122)	③
1929	52532	156289	105420	261709	③
1931	199091 (55032)	483591 (168266)	423999 (129850)	907590 (298116)	③、④
1934	72721	192136	144341	336477	⑤
1935	74720	225843	163954	389797	⑥
1941	74734	173510	139610	313120	⑦
1952				379706	⑧

备注：①“户数”据曹允源等：《吴县志》卷四九，《田赋》，第 3 页；“人口数”据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第 496 页；②《海关十年报告·苏州》（1902—1911），陆允昌编：《苏州洋关史料》，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8 页；③乔增祥：《吴县》（城区附刊），“地方自治”，《吴县城区过去各项公益事宜调查表》；据《苏州市志》，1928 年苏州市区人口为 289122 人（参见《苏州市志》第 1 册，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6 页）；④1931 年数据与 1929 年差距过大，怀疑误以吴县全县人口

① 乔增祥：《吴县》（城区附刊），“地方自治”，《吴县城区过去各项公益事宜调查表》，第 5 页，《吴县城区户口增减调查表》，吴县县政府社会调查处 1931 年出版。

② 乔增祥：《吴县》（城区附刊），“地方自治”，《吴县户口统计表》，第 1 页，吴县县政府社会调查处 1931 年出版。数据为笔者根据苏州城区“住户”和“船户”两项统计而得。

③ 此数据为吴县公安局 1933 年 9 月至 1934 年 1 月调查所得，《苏州明报》1934 年 2 月 1 日。

④ 吴县县政府：《一年来吴县县政概要》，“自治与保甲”，第 6 页，《吴县各区乡镇保甲户口总数表（表三）》，1935 年 7 月出版。